

变革背景下农村教师的 “体制内生存”与“日常反抗”

以皖中 L 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例

葛春 著

RESEARCH ON THE
RURAL TEACHERS' SURVIVAL IN THE
SYSTEM AND THEIR DAILY RESISTANCE UNDER
THE REFORM

几匹瘦骨嶙峋的马拉着农村教育的车子，
吃力地行驶在曲曲折折的乡间小道上。

尽管吃力，车子仍在向前行驶；

尽管瘦骨嶙峋，这些马仍倔强地撑起农村教育的蓝天。

教育部 2011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专项“新课程改革中农村教师‘日常反抗’
的认识与应对”（11YJC880024）资助
扬州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变革背景下农村教师的 “体制内生存”与“日常反抗”

以皖中 L 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例

葛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革背景下农村教师的“体制内生存”与“日常反抗”：
以皖中L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例 / 葛春著.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684-0312-2

I. ①变… II. ①葛… III. ①农村学校—中小学—教师—现状—研究—中国 IV. ①G63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6361号

变革背景下农村教师的“体制内生存”与“日常反抗”

——以皖中L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例

Biange Beijing xia Nongcun Jiaoshi de Tizhi nei Shengcun yu Richang Fankang

著 者/葛 春

责任编辑/周凯婷 米小鸽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30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7.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312-2

定 价/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前 言

本书是关于教育变革中农村教师与国家权力互动关系的教育社会学研究。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社会学界将之称为社会转型。在此转型中,我国的城乡关系经历了急剧的调整与变迁,原本彼此隔绝的“城乡”分割局面因不断遭受逐渐加速的城市化进程的冲击而日益松动、瓦解。伴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与乡村间的自由流动,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区逐渐扩展延伸,形成了明显的城市化效应。城市化效应对农村社会的结构、文化、教育、个体心理等各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正在日益远离我们。在城市化的宏观背景中,原本相对不同于城市教育模式的农村教育模式,正呈现出与城市教育同质化的趋势;同时,农村教育在转型的过程中也产生诸多与城市化效应相关的现实问题。

在我国城乡关系不断变化、调整的过程中,作为农村教育主要践行者的农村教师群体受城市文化的影响、熏陶,其权利意识、群体意识、职业意识等都得到了强化。同时,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权力对农村教育的控制和形塑能力也大大提高,这时在权利意识觉醒的农村教师与农村教育场域中不断增强的国家权力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出现了新情况,产生了新问题。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近年来中国教育界的重大事件之一,

它是在国家权力推动下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教育变革。课程改革在农村教育实践层面的真实境遇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农村教师的态度和反应也是人们研究的热点。在国家推进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农村教师与国家权力间将不得不产生互动,这种互动是一种什么样态、二者产生冲突后将如何解决、作为理性能动者的农村教师会在实际行动中做出何种行为选择等,都将是本研究所关心的基本问题。

本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即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结语。

导论是全书的导引,它主要呈现了本研究的研究缘起、可以利用的理论资源、采取的研究方法等。

第一章是变革的社会背景。分析了“城乡分割”格局对城乡社会与城乡教育的影响。改革开放前,严格的“城乡分割”体制导致了中国社会被人为地分为城市和乡村两种社会空间,国家公民被分为地位存在差异的市民与农民,而教育也被区分为彼此相对独立和不同的城市教育模式与农村教育模式。30多年来,由于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存在多年的“城乡分割”格局正在瓦解松动,由此导致了农村人力、物力等资源向城市的流动,进而在农村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城市化效应”,这种效应对当下的农村教育产生了一系列的实质性影响,因此城市化成了农村教育变革的外在社会背景。

第二章是皖中L县的社会与教育。这是对本研究的典型案例——皖中L县——的社会与教育状况的全景式描述,试图真实地勾勒出皖中L县的区域性教育背景。

第三章是农村教师的“体制内”生存。先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农村教师整体上从“体制外”走入“体制内”的历程,并通过分析农村教师社会地位,得出农村教师是“体制内弱者”的结论。伴随着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及由此产生的农村教育的办学

集中化趋势,农村学校单位成为农村教师们的常态化生存场域。农村学校单位一方面给予农村教师们体制性庇护,另一方面也会对教师们进行控制与规训。在日常生活中,农村教师也会有着自己的生存伦理,当自己的表现为权益的生存伦理受到侵害时,他们就会采取“前台”的公开反抗或“后台”的日常反抗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第四章是农村教师的日常反抗。基于对皖中L县的实地观察,笔者发现当地农村教师在新课程改革中,大多对课程改革持反对态度并伴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这些主观的反对态度和消极的相对剥夺感导致农村教师在新课程改革中日常反抗行为的大量存在。在具体的教育现实中,农村教师采取多种策略,成功地实现了其反抗行为的隐蔽化和日常化,这样既保护了农村教师的自身利益、教学自由及价值文化,也消解了课程改革政策的执行力和影响力。从功能分析的角度来看,农村教师的日常反抗行为具有正向与负向两种属性的功能,区分农村教师日常反抗是否具有正向功能,主要看该日常反抗行为是否出自于农村教师的理性选择。

结语是对整个研究内容及研究工作的总结与反思。

葛 春
2016年7月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1

- 一、个人生活史中的陌生区域及“他者”视角的可能性 1
- 二、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际际遇的继续探索 3
- 三、农村教育与农村教师的重要性 5

第二节 理论资源 9

- 一、相关概念界定 9
- 二、已有研究梳理 13

第三节 研究方法 24

- 一、农村教师的个案研究 25
- 二、资料搜集的方法 30

第一章 变革的社会背景 36

第一节 “城乡隔绝”状态下的城乡关系与农村教育 37

- 一、“城乡隔绝”体制的形成与强化 38
- 二、“城乡隔绝”状态下的城市与农村 42
- 三、“城乡隔绝”状态下的农村教育 45

第二节 “城乡隔绝”松动后的农村社会与农村教育 51

- 一、“城乡隔绝”体制的松动 52
- 二、“城乡隔绝”松动后的农村社会 56
- 三、“城乡隔绝”松动后的农村教育 63

第二章 皖中L县的社会与教育 71

第一节 皖中L县的社会与人 72

第二节 皖中L县的教育与教师 78

- 一、皖中L县的教育 78
- 二、皖中L县的教师 97

第三章 农村教师的体制内生存 104

第一节 作为“体制内弱者”的农村教师 105

- 一、从“体制外”到“体制内”：农村教师地位演进的历史考察 106
- 二、农村教师的社会地位 116

第二节 农村学校单位：农村教师的生存场域 127

- 一、农村学校的单位化 128
- 二、农村学校单位化的影响 134

第三节 农村教师的生存伦理与反抗 143

- 一、农村教师的生存伦理 143
- 二、农村教师的反抗 154

第四章 农村教师的日常反抗	166
第一节 新课程改革中农村教师的态度、相对剥夺感与日常反抗	168
一、农村教师对新课程改革的态度	168
二、新课程改革中农村教师的相对剥夺感	173
第二节 新课程改革中农村教师的日常反抗策略与表现	182
一、从皖中 L 县新课程改革的总结性文本谈起	183
二、农村教师的日常反抗策略	189
第三节 新课程改革中农村教师日常反抗的功能分析	196
一、农村教师日常反抗的正向功能	199
二、农村教师日常反抗的负向功能	206
结语	212
附录 农村教师现状调查问卷	217
参考文献	223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一、个人生活史中的陌生区域及“他者”视角的可能性

在过去的 30 多年间,中国城乡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许多乡村社区被城市吞没,大批原本拥有农村户籍的农民转变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镇市民,而笔者就是这场宏大社会变迁的直接见证者和经历者。1996 年,笔者所居住的村庄的最后一块土地被开发商征用并盖起了大楼,随后,笔者曾经拥有十几年的农民身份也转变成了城市市民身份,这种转变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令人激动与兴奋的事情。因为在长期的城乡二元格局下,城乡发展存在差异,农民与市民成为两种不同地位的国家公民,所以变成城里人是当时许多农民的梦想。

对笔者而言,乡村社会与城镇社会、农民生活与市民生活等各方面的异同,都曾经亲身体验过。笔者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并且至今笔者的许多亲戚还居住在农村,因此关于农村社会及农民的生活笔者有一定的了解。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笔者上学读书的日子越来越远,而笔者所居住的村庄却渐渐地被不断新建的城市社区所包围,而村子曾经拥有的土地也一块一块地被征用开发,或盖起了住宅楼,或建成了学校和干部休养所,笔者出生的村庄成了当地著名的“城中村”。8 岁那年,笔

者在家附近的一所城市小学入了学,当时作为农村孩子的笔者之所以可以进入城市小学,完全得益于城市化的发展。因为这所市区小学所用土地原本是笔者所在村庄的耕地,后来被政府征用。按照当时村里与该学校的协议,本村适龄儿童可以不受户籍限制到这所学校读书,就这样笔者顺利地成为这所学校中为数不多的非城市户籍的小学生。因此,笔者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所造就的一小批特殊人群中的一员,即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却从未进入过农村学校,也从未在求学生涯中真正接触过农村教师。

但是,没有亲身经历过农村教育,不代表对农村教育和农村教师一无所知,笔者的许多亲戚在农村读过书,更有很多亲戚就在农村中小学任教,从他们那里笔者对农村教育和农村教师有一些间接的了解。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非常推崇“他者”的目光,强调克服那种“熟视无睹”的研究弊端,与研究对象拉开一定距离后再进行观察和研究,即所谓的“变熟为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村教育与农村教师这个问题对笔者而言是个相对陌生的领域,但是也正由于笔者的这种陌生人地位,即用一种局外人和“他者”的目光去观察、审视、思考农村教育和农村教师诸问题,或许可以得到关于农村教师生活与行为的新发现和新结论。

当笔者选定农村教师的生活及“日常反抗”作为研究领域后,笔者先是通过个人关系,进入安徽一所农村村小,并与该校的教师同吃同住相处了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对农村教师的日常生活进行最直接的观察和研究。这次调研成为笔者整个研究的预调研,那段时间中的许多所见所闻,成为笔者此后诸多命题假设的最初来源,并为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取向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此后,在正式开展调研的过程中,笔者先后两次住进农村中学,每次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那段时间中,

笔者与那里的教师们进行了面对面的直接互动,近距离地观察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同时,笔者在这段时间中还对周边的其他几所学校进行了走访,以期了解不同类型学校的教师们的生活与工作。此外,笔者也非常注意与农村教育场域中的其他人群进行接触,比如学生、家长、教育行政人员等,以期通过这些对于教师而言属于重要“他者”的多视角来了解农村教师形象。

二、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际际遇的继续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由于改革的力量而发生多层面、多方位的变迁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些巨大成就面前,改革成为推动社会各领域发展的根本手段,以致很多人都认为改革是万能的,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教育领域,许多人也抱有类似的观点。因此,“新千年”到来的前夕,面对中国基础教育中多年累积的问题,社会各界迅速就改革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于是乎一场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并结合中国基础教育现实问题研究的新课程改革在中央政府的权力动员下自上而下地开展起来。这场已经开展了十余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中国家投入最大、改革内容涉及面最广、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教育变革之一。这种影响力的间接证明之一,就是笔者在考研究生时从一名非教育专业的本科生转投到教育学门下,当时促成笔者这种转变的就是基础教育改革中所提出的先进理念及透过这些理念所勾勒出的教育美景。

但是,经过了3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加复杂,利益群体间的博弈更加激烈,市场等非政府因素对改革的影响力更大。可以说,虽然改革的设计者较理性地为课程改革做出了规划和设计,但是当市场经济规律和具有极其复杂性的教育现实真正与改革相互碰撞的时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课程改革却似乎显得非常杂乱、缺乏理性和不具可操作性。在笔者对农村教师所做的问卷调查及访谈中,超过半数的教师对新

课程改革持不认可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他们普遍认为新课程改革在内容、理念上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它缺乏对农村教育的关照,并且认为从课程变革入手却不取消高考等教育评价手段,本身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因此他们普遍预言新课程改革在农村难以成功。当然,农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不友好态度,在其“为了农村教育好”的台面上理由之下,农村教师的个人利益及其维护教学自主权的冲动是教师反对课程改革重要的台面下理由。在对农村教师和农村课程改革的观察与研究中,笔者逐渐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即任何教育改革都是改革的设计与社会现实相互适应与形塑的过程及结果,它们是一种交互影响的关系。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笔者所学的专业是课程与教学论,那时候正是课程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广宣传的时期,人们对当时的教育现实非常不满并对新课程充满了期待,因此当时几乎所有的教育研究者或教育从业人员都是开口必言新课程改革,整个教育界沉浸在兴奋之中,可以说那段时期是新课程的“蜜月期”。对于笔者而言,由于自己专业与课程改革紧密相关,所以笔者和笔者的同专业同学们一直非常关注课程改革的进展,但由于当时研究方法及其他条件的局限,笔者对课程改革的了解大多来自于各种文字材料和他人的转述,而对课程改革在基础教育中的真实境遇缺乏直观的认识,这对笔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现在由于进一步研究的需要及其他方面条件的逐渐成熟,直接进入基础教育的现实场域进行实地的观察研究成为可能与必要。与城市相比,农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速度较慢,而且中央政府的行政推力产生的影响也更弱,此外新课程在其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城市化倾向也一直受到教育专家和农村教育工作者的诟病,因此新课程改革在农村教育中的真实境遇就更能激起笔者的探索激情与欲望。在本研究中,出于对新课程

改革的进一步研究,笔者选择了农村教育作为研究领域,以农村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并将详细地探究在新课程实施中,农村教师的顺从或日常反抗等行为,以期揭示来自教育基层的农村教师们的众多珊瑚礁般的个体行为对来自国家层面的教育变革的真实影响力,并希望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农村教师与国家间的可能互动模式。

三、农村教育与农村教师的重要性

农村教育对每个农村个体、农村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无疑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别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宏大背景下,农村教育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农村学生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城乡社会之间的均衡发展及更大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就被人为地割裂成城市与农村两个不同的社会空间,国家为了能够积累起城市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而在工业品与农产品交换中实行价格的“剪刀差”,进而直接导致了城市对农村与农民的剥夺,形成了农村社会从属于城市社会、农村经济依附于城市经济的格局。在此格局中,市民与农民成为受国家庇护程度完全不同的两大人群,进城当市民是那个时候大多数农村年轻人的梦想,而接受教育并通过教育选拔成为市民是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有限合法途径之一。

如今,我国的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城乡间流动的渠道已经多元化,市民与农民间的不平等待遇也大大减轻,但是教育仍然是农村孩子离开农村并实现个体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在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中,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模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解释力。该理论认为,社会分层结构是个多层面的统一体,除了经济地位之外,声誉与权力等要素也是同样重要的分层属性。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采用多元分层标准逐渐受到社会学界的认可。在我国,影响社

会成层的要素,大致可以归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权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等,出生于农村的孩子在经济资本、权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占有和运用方面与城市孩子有着先天的差距,他们唯有通过自身的刻苦学习、借助文化资本的不断积累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于整个中国社会而言,农村教育担负着中国一半以上适龄儿童的正规教育,特别是对于农村巨大的留守儿童群体,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席和社区教育的不力,学校教育几乎成为他们在该阶段应该享受教育的全部。因此,办好农村教育,从微观层面来看,它将提升每个农村孩子的知识素养,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从中观层面来看,它将有助于提高整个农村青年人群的素质,而他们中的许多最终又会流入城市,进而更好地为城市发展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并促进中国城市和经济健康发展;从宏观层面看,办好农村教育,关系到最广泛意义的社会公正和公平,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农村教师是当下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职业群体,关于他们,我们有着看似清晰却也模糊的认识,并对其抱持着比较矛盾的态度。这从目前国内有关媒体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出,一方面我们为农村教师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执着和坚持而感动,正如《瞭望》杂志在其2007年第7期上曾转引的一段外国记者对我国农村教师的形容:“几匹瘦骨嶙峋的马拉着农村教育的车子,吃力地行驶在曲曲折折的乡间小道上。尽管吃力,车子仍在向前行驶;尽管瘦骨嶙峋,这些马仍倔强地撑起农村教育的蓝天”;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听到“某农村教师被铐受审致死”“某农村教师猥亵幼女”及“范跑跑”“杨不管”等一类关于农村教师的负面报道,这些反映农村教师道德素质的报道引起公众对当代我国农村教育师德下滑的担忧。这些表面看似相互矛盾的报道给笔者这样一种感觉:这些报道都只是从

现象和表面来认识农村教师这个巨大而复杂的职业群体,这种片面化的报道必然会遮蔽农村教育和农村教师生活的真实面貌。因此,为了弄清楚农村教师的真实的日常生活和农村教育当下的真实状况,笔者选择以农村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此外,有统计显示,我国目前约有 1000 万中小学教师,其中 80% 在农村地区任教^①,因此农村教师的质量与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在农村教育中,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主要行动者和践行者,任何教学、教育变革的实现最终都需要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特别是对当前投入如此巨大的课程改革而言,如果想要真正发挥其预想的功效更需要广大基层教师的认可与践行。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变迁和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农村教师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教师承担的社会责任较过去呈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责任从家庭和家長向学校和教师转移;二是社会责任从农村邻里社区向学校和教师转移。具体表现为,由于政府实施学校布局调整后,学校数量减少,每个学校相应的学区面积扩大,导致不少孩子中午无法回家,有的还需要在学校或在学校附近的教师家中寄宿。这些学校一般都没有条件单独配备生活辅导员,学生日常生活和教养的社会责任很自然地转移到了教师的肩上。还有一些学校由于升学压力而延长教学时间,加上农村家長作为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而导致的家庭教育功能下降,这种社会责任从家庭向学校和教师转移的情况也相当普遍。这样,学校的教师们不仅承担了本来就十分繁重的一般

^① 参见《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2007年,全国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有专任教师 907.7 万人,其中小学 561.3 万人,初中 346.4 万人。从城乡分布看,县镇和农村的教师占 82.7%。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约有 1/4 的教师工作在艰苦地区。

教学任务,而且还承担了学生课外学习辅导和日常教养等任务,相当一部分农村教师实际上还同时承担了未获法律认可的儿童监护人角色。像笔者蹲点调研的安徽某初级中学,初三的学生大都住在学生寝室中,以便于晚上统一上自习,学校每天安排两位教师专门负责学生们的日常生活。

总之,农村家庭化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区文化生活的贫乏,特别是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之后,农村社区组织变得极其松散,部分地区农村社区的多项社会功能严重削弱,农村的社区教育功能因而明显下降,很多原本应由社区承担的社会教育责任也向学校和教师转移。农村地区社会文化生活相当贫乏,有组织的社区文化活动已经极为少见,学生放学回家除与同伴游戏外,主要就是帮忙做家务或者和家人一起下地劳动,与邻里其他成人的交往机会很少,更难得参与社区的文化活动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父母等家庭成员外,教师几乎成了儿童生活环境中唯一的“重要他人”。在有些劳动力外流现象比较突出的农村地区,由于父母常年外出务工,承担监护人角色的祖父母或成年弟姐妹因文化代沟或忙于农活,很难对儿童社会化过程产生应有的影响,这时教师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承担的“重要他人”角色任务甚至超过了儿童的家庭成员。在一般情况下,教师原已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引导和促进儿童社会化的教育任务,农村社区文化生活的贫乏,进一步加重了教师在儿童社会化方面的任务,直接导致了教师在这一方面的社会责任的扩展。^①

^① 项贤明:《中国西部农村教师社会责任的功能性扩展》,《教育研究》,2004年第10期。